



□ 杨传召



提到中国早期军事与战争智慧，绝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孙子兵法》。实际上，早在孙武之前五百年的西周早期，便已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兵书——《六韬》。《六韬》是西周崛起时期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私人对话的记录，后世许多学者因其流传中形成的一些问题而质疑该书，忽视了《六韬》重要的历史价值。实际上，《六韬》的主体内容确出于西周早期，该书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西周崛起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的认识。然而，由于历史的悠远与内容的敏感特殊，它遭遇了更多的颠沛与质疑，以至于直到今天《六韬》的声名都远不如“孙吴兵法”来得响亮。但它始终伫立在历史的幕后而未曾离开过，也隐秘地滋养着春秋战国以至后世的无数的军事家与战将。

长期受质疑的古典军事著作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六韬》共六大篇，依次是《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全书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一问一答的对话形式，记录了两代君主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为政、治军选将、抗击殷商以及具体战略战术等各类问题。

然而，经历了战国的烽火、秦代的焚书坑儒、汉末与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不少珍贵典籍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杳无踪迹。即使那些在中华文明中地位最为重要、流传最为广泛的经典，也因历史的剧变而模糊了本来的面貌。正因如此，唐宋以来的学者常会发现经典文献中的一些不合情理之处，进而对整部书的真实性质疑，乃至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

《六韬》也在被怀疑之列——后世学者发现《六韬》中的一些记述与商周之际的历史情景不符，比如书中关于骑兵战术的讲述十分翔实，但骑兵在古代中国战场上的大规模使用，则是战国时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以后的事情。因此，不少人进而否定《六韬》一书与姜太公之间的联系，于是提出了该书成书于战国、秦代、汉魏等种种说法，认为《六韬》仅仅是后世兵家托名姜太公而作。

在殷周更革的风云际会中，姜太公是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一位人物。《诗经·大雅·大明》中以充沛的感情描写了姜太公在武王灭商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三军阵前的统帅姜太公，仿佛雄鹰展翅翱翔天际。他辅佐我们的武王，讨伐那无道而强大的殷商，一日之间便扫清乾坤。留存在《诗经》中的这些篇章，典型地反映了姜太公在西周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

与周朝建立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相仿

佛，在周朝壮大以至反抗殷商的过程中，姜太公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与此相当，周代史官必然对太公的重要言论主动加以记录与整理。周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史官系统发达。对历史经验特别重视的周人不仅书于典册，甚至将最为紧要的“最高机密”内容铸造在“金版”上收藏起来，《六韬》就属于这样的“最高机密”。

“最高机密”的复杂与真实

殷周之际的历史动荡造就了文王、武王以及周公、太公、召公这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和超凡智慧，一定深受周人的重视。《逸周书·大聚》讲到武王召专门的官员负责将周公的一些重要言语铸造在“金版”之上典藏起来，并且时常阅读。《群书治要》本的《六韬·武韬》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太公曰：‘……屈一人之下，则申万人之上者，唯圣人而后能为之。’文王曰：‘善。请著之金板。’”周人将先王先圣的一些嘉言善语冶炼在铜板之上，足见人们对这类言论的重视。

史官对于文王、武王与太公讨论请教的记录，不难理解的是，其中一些内容关涉到反抗殷商暴政的谋划，最初都属于极小范围内传播的机要之事。直到后来，随着周王朝政权的稳固、制度的变迁以及教喻子弟的需要，这些内容才流传开来，汇编而成为《六韬》。

韬，即“收藏”之意，本指弓或者剑的套子。“韬”字本身就提示了《六韬》最初的隐秘性质。因为《六韬》与太公、史官、金版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它又有《太公兵法》《太公六韬》《金版六韬》《周史六弢》等种种别称。一些学者因为名称的多样而否定《六韬》连贯的历史，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六韬》其书的特殊性以及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六韬》的另一特殊性，在于它“兵书”的属性。以《论语》为代表的“思想性文本”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性文本”，其“作者”虽不明确，但在早期中国，人们很少会出于私心故意改动作品内容本身。而兵书这类“实用性文本”则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兵书如果不能适用于现实的战争状况，便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在后世不断的转写传抄之中，兵书都会做出一定的适应时代语境的修改。后世兵家学者为了自己的学说得到更好传播，往往也借助其权威性，将自己的一些看法假托在“祖师爷”身上。《汉书·艺文志》就指出：“《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作者所增加也。”可见当时已有假托太公的作品出现。这也就是今天《六韬》中为何存有骑兵战法这类后世内容的原因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深入与新材料的发现，进一步确认了《六韬》写作于西周早期的历史事实。譬如1972年银雀山汉简与1973年定州汉墓竹简先后挖掘出土，其中都出现了和《六韬》及“六韬佚文”相合的内容，学界基本一致认为这些竹简的书写时间在西汉初年以前。这些实物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六韬》的成书年代至少也要上溯到战国之世。秦汉、魏晋时代伪撰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更有学者指出，《六韬》不仅与《尚书》《逸周书》多有相合之处，甚至有敦煌遗书中唐人手抄《六韬》的记载，它也和周原甲骨中不见于其他先秦史籍的“衣（殷）王田至于帛”的记载相

得去、打得赢。

加快转型发展。紧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聚焦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按照国防和军队建设“新三步走”战略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刚性执行落实“十四五”规划，推动武警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更加注重聚焦实战、创新驱动、体系建设、集约高效、军民融合，不断推动武警部队军事理论、组织形态、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现代化。

严密维稳维权。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把握武警部队常备常用、突发急用、多样并用、广域运用任务特点，精心筹划组织执勤、处置突发性社会安全事件、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海上维权执法、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六位一体”任务，科学摆布任务与建设、前方与后方、大项任务与常态执勤的关系，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严密防范“灰犀牛”事件，切实把各种工作想在前、谋在前，把各种问题遏于未萌、止于未发，以超前布局、周密

合。这都是后世兵家所无法伪造的地方。

《六韬》的主体内容与部分“六韬佚文”，已经被证明是出于西周早期的太公之言，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太公遗说”。这些内容，是太公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姜太公思想的最主要途径。

不止于“兵”的“兵法”

礼乐刑政，皆是国之大端。军事与战争，是国家政治治理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后世如吴起、白起等无数战将谋士，虽然在沙场上所向披靡，但在政治与人生中终落得令人叹惋的悲惨结局。而太公作为中华兵学始祖，在三千年前便已清楚地认识到军事与国政大局的交互关系，在天下大势与人性之理的格局之中去理解与处理军事的问题。

《六韬》开篇记述文王与太公最初的相见，太公便明确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为国之大务，爱民而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社会治理的根本问题，也预示了殷商破亡、周族兴起的根本原因。

《文韬》中有《明传》一篇，记载文王病重时太公为文王讲述“至道之言”，当时还是太子的武王也在场。文王要“明传之子孙”，足见这些言论的重要性。太公说：“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太公特别重视“义”与“敬”，他说：“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如此这些记载，场面清晰生动，而且思想丰富深刻。

《汉书·艺文志》中将当时与太公相关的文献分为“言”“谋”“兵”三类，这也符合《六韬》一书整体逻辑的划分。《六韬》首先讲述了先王圣贤治理的经验、君臣民关系的处理、选人用人、守土卫国之方等内容，期待文王以学习先哲、养民爱民为先，修德务本，巩固自身。

在这些“言”之后，是“谋”的部分，这是谋划反抗殷商霸权暴政的准备阶段。《武韬·发启》承接前文修德的内容而向下继续行文：“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通过对形势的具体分析，太公强调以天下公义为追求，重视起义兴兵的正当性。《武韬·文伐》则讲述了非直接对抗状态下的斗争方法，篇末引出了“兵”的部分：“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此后，进而论述军事斗争中的一系列要点，这正是司马迁所说：“周西伯昌之脱美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由此可见《六韬》全书结构上的严密齐整。

《六韬》在后世被视作兵书，但实际上其意义则远超乎军事领域之上。《六韬》滋养了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军事家与名将，并通过他们确立起了中华兵学的基本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在其指导下的商周之战，远非止一场战争的胜负而已，其背后是进步文明取代落后文明的统治，民本、厚德、崇贤的文明在神州大地确立起来，茁壮成长。通过《六韬》所展示的历史与太公智慧，人们能够看到中华先哲们苦心求索的坚实步伐。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准备的有力行动，有效维护国家和社会大局稳定。

深刻把握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时代要求,坚持依法从严,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努力锻造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尊崇的文明之师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保卫人民美好生活，是党和人民对武警部队的时代重托。武警部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不管是98抗洪还是汶川地震救援，不管是抗击非典疫情还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不管是实施“春蕾计划”资助春蕾女童还是推进“三区三州”脱贫攻坚，武警官兵在奋勇拼搏中留下了一个个“最美逆行”“最美背影”“最美笑脸”，用热血忠诚书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诗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武警部队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是力量之源、胜利之本，自觉把坚定人民立场、保卫



《尚书》中，大禹将“知人”“安民”两件事称为“惟帝其难之”，孔子继承了这种表达，在《论语》中用“尧舜其犹病诸”来形容理想的施政境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子路问君子，孔子说君子要做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并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尧舜二帝也因为不能做到博施济众而感到愧对于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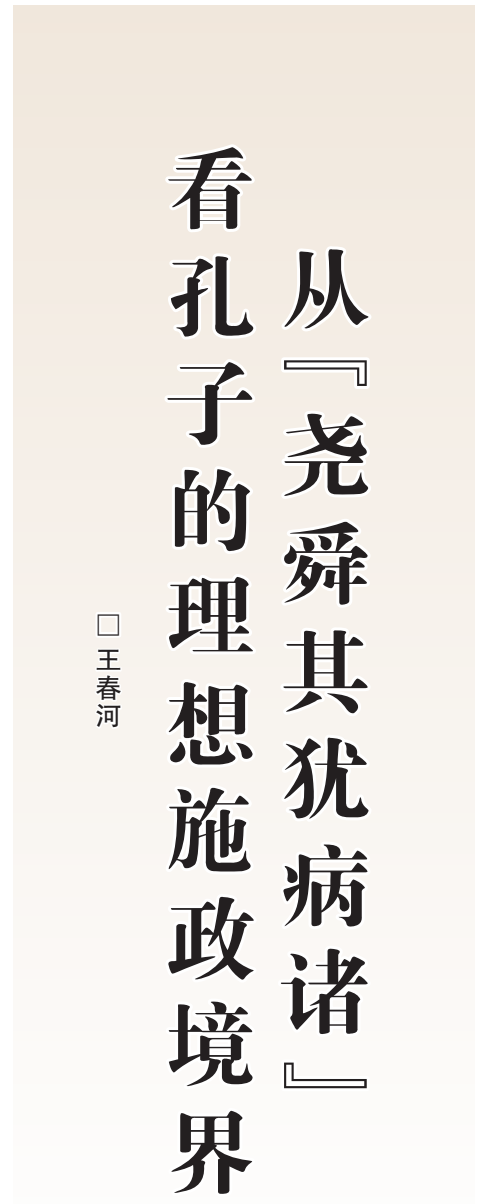
在孔子心目中，“修己以安百姓”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境界，超越了“仁”，连尧、舜这样的圣人都难以达到。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都非常崇敬尧、舜这样的圣人，甚至构建了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主的儒家“圣人谱系”。孔子以圣人为衬托，更加说明这种施政境界的难能可贵。从孔子对“尧舜其犹病诸”的表述可以看出，孔子积极赞美和认可的施政理念，无外乎两件事：一是修身正己，一是安民富民。

修身正己是达到理想施政境界的前提

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前提都是“修己”。唯有先“修己”，才能做到对人和事的“敬”，才能“安人”，做到团结周围大多数人，让他人感到安乐，而“修己以安百姓”则是修身正己的最高目的，也是为政者施政治国的理想境界。孔子非常重视为政者个人道德的建设，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将为政之德提高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北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文化意蕴，将为政之德与北辰相比拟，是孔子的一大创见，是对西周时期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观念的创新性发展。孔子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认识到君主和大臣的欲望往往给百姓带来困苦，只要掌握权力的为政者能够修身正己，何愁天下不安。孔子抓住为政者这一群体，试图从根本上促进为政之德的广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众多的问政应答中，孔子面对季康子的问政，直言“政者，正也”，其中有深意存焉。正道是政治的本性，而“子帅以正”之言，说明孔子将修身正己看作维护正道的根本之途。“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反复申说“正己”的重要性，正是要为政者认识到修身正己是施政的必要前提，没有德性的政治，必将走入歧途，引起混乱。《左传》评价晋君“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指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对为政者而言，要时刻注重自身的一言一行，心正方能身修，身修方能家齐、国治、天下平。唐太宗李世民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揆诸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的出现以及桀、纣等王朝末世昏君暴行，可以看出为政者以身作则、正身立德往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安民富民是儒家追求的理想政治愿景

“安百姓”和“博施济众”表明，孔子认为为政者要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为老百姓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要制定普惠性的富民利民政策，让老百姓都更有安全感、获得感。安、博施、济这三个词汇包含了“给



□ 王春河

予、关怀、照顾、普惠”的意思，这种正向的输出，说明孔子始终把民众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这与孔子“仁者爱人”的主张是一致的。孔子评价子产为政具有“养民也惠，使民也义”的君子之道，充分认可惠民之德和以道义使用民力的行为。安民富民并非一个虚浮的口号，孔子提出“庶、富、教、食、兵、信”的基本方略，从人口、富民、教化、经济、国防、信用等六个方面，阐明安民富民是为政者的努力目标。孔子认为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人口多了，就存在不安定因素，要“富之”，让他们生活富足，然后“教之”，提高百姓的精神文化素养。孔子尤为注重“安民”，当子贡问到在“足食、足兵、民信”之中非不得已只能保留一项时，孔子毫不犹豫选择“民信”，政府只有获得百姓的信任才能确保社会安稳，长治久安，为百姓创造安定的生存环境，这也说明政府做到“安民”是多么重要。富民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认可人们对富裕生活的追求。哀公问政，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如何做到呢？孔子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在孔子的思想中，不仅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足，还要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安乐幸福的生活环境。孔子为中都宰时“制为养生送死之节”，充分抓住了民众最关心的事：养生与送死，然后推行礼仪教化，“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达到了“路不拾遗”，其他诸侯纷纷学习的效果。

“尧舜其犹病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理想施政境界的夸张式表达，同时也是对为政者以民为本施政行为的鞭策和鼓励。面对纷乱的社会局势，孔子利用人们对尧舜等圣人的崇敬之心，将修身正己和安民富民的施政理念提高到一定的地位，正是希望为政者深刻认识到国家的安稳、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官员群体修身立德的自我意识以及安民富民的主动担当。

（作者系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

（上接1版）历史深刻启示，武警部队必须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核心需求为导向，着眼使命任务不断从陆地向海上、维稳向维权、境内向境外延伸拓展，力量结构由单一内卫执勤向机动处突、反恐特战、空中支援、应急救援、海上维权执法发展壮大的实际，始终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不断锤炼制胜本领，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全力练兵备战。深入贯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牢固确立练兵备战的中心地位，坚持训练与任务一体化，加快构建训练内容实战化、组训方法科学化、考评比武规范化、训练管理精细化、训练保障科技化、军事教育专业化的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坚持任务牵引抓训练，抓实重大演训强能力，严格精细规范备战战。加快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加快构建军地协调联动新格局，全面提升稳固可靠的执勤安保能力、机动迅速的应急处突能力、精确高效的反恐突击能力、立体综合的维权执法能力、专业科学的抢险救援能力和高效协同的防卫作战能力，确保一旦有任务能够拉得出、上

肃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纯正政治生态，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突出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坚持从各级党委机关抓起，从领导干部严起，自觉听招呼、守规矩、守底线，尤其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旗帜鲜明抵制不良思潮和错误观点，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的问题敢于亮剑，坚决清除杂音噪音和污浊空气，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

树好形象。坚持在执勤安保中树立依法文明、热忱服务的形象，做到既严格正规、又亲和为民；在处突维稳中树立依法正义、威武威严的形象，做到既高效处置、又严守政策；在反恐行动中树立敢打必胜、素质过硬的形象，做到既不怕牺牲、又精确制敌；在维权执法中树立大国海警、强国海警的形象，做到既捍卫主权、又谨慎稳妥；在抢险救援中树立竭诚为民、无私奉献的形象，做到既全力以赴、又科学施救；在防卫作战中树立服从大局、联合制胜的形象，做到既稳内压舱、又密切协同，用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忠诚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作风形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